

# 近代早期教廷傳信部的對外政策

## ——以遠東地區為中心\*

張 銳

[提 要] 1622 年,羅馬教廷成立傳信部,其目的在於促進和協調天主教會在世界範圍內的活動。傳信部繼承了宗教改革時期特蘭托大公會議的精神,憑藉其宏大的視野,很快成為教廷最為重要的聖部之一。它旨在掙脫世俗政權的枷鎖,鞏固教皇“崇高”的地位,維護教會“絕對”的權威。針對遠東地區,傳信部不斷與葡萄牙的“保教權”博弈,推廣“宗座代牧”制,並將目光投向了法國,尋求保護與合作;此外,在後者的協助下,又派出多羅特使訪華,試圖解決“中國禮儀之爭”,與清廷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繫。雖然,羅馬教會的活動或多或少受到了歐洲列強的制約,但傳信部的出現實則改變了教廷對外政策的路徑,開啟了天主教全球化的征程,對東西文明交流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 羅馬教廷 傳信部 保教權 遠東地區 多羅特使

[中圖分類號] B97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4)03-0087-09

### 一、傳信部的成立背景

近代早期,歐洲出現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國等海上帝國。面對這些不斷壯大的殖民政權,羅馬教廷採取了一種所謂的“利益均衡”政策。<sup>①</sup>教皇允許不同國家的君主在殖民地建立教會,並賦予他們特權,俗稱“保教權”(Patronatus missionum)。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王權與教權的交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遠東的傳教事務。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教權”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歐洲列強不斷將本國文化強加於當地民眾,不同國籍和修會的傳教士彼此競爭,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工作進展緩慢,世俗政權與羅馬教權紛爭四起。因此,教廷急需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遏制殖民勢力的干涉,確保各地教會的健康發展。<sup>②</sup>

1622 年 1 月 6 日,教皇額我略十五世宣布成立傳信部(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sup>③</sup>同月 15 日,向教廷駐外使館發出通函;<sup>④</sup>6 月 22 日,頒布宗座憲令《不可思議的神聖》(Inscrutabili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羅馬教廷對華政策研究(1622-1939)” (項目號:21CZJ023) 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教廷傳信部與天主教的全球化研究(1517-1742)” (項目號:43800-20103-222299) 的階段性成果。

*Divinae providentiae arcano*),正式將其合法化。<sup>⑤</sup>傳信部成立時的宗旨有二:一是促進與基督新教和東正教的合一;二是在非基督宗教的國家和地區傳播天主教信仰。<sup>⑥</sup>額我略十五世,原名亞歷山大·盧多維西(Alessandro Ludovisi),畢業於耶穌會創辦的羅馬公學(Collegio Romano),<sup>⑦</sup>是教會改革的支持者,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的資助者。<sup>⑧</sup>歷史學家帕斯托爾(Ludwig von Pastor)評價稱,沒有任何一位教皇能與他相媲美,在極為短暫的任期內留下了如此深刻的歷史烙印。<sup>⑨</sup>當額我略十五世上任時,已年近古稀,年邁體弱的他,更加渴望看到天主教在歐洲、近東,甚至是遠東的傳播。<sup>⑩</sup>

教廷成立傳信部之舉,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以及法國首相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等歐洲權勢人物的堅定支持。<sup>⑪</sup>在教廷的一份檔案中可以發現,黎塞留的幕僚、方濟各嘉布遣會士約瑟夫·德·帕利斯(Josef de Paris)很快成為傳信部在巴黎的代理人(Agent)。<sup>⑫</sup>旅居馬德里的意大利人阿戈斯蒂諾·斯皮諾拉(Agostino Spinola)樞機在一封書信中也透露,因為擔心“異端”在美洲大陸的不斷擴散,西班牙王室對成立傳信部深表贊同。<sup>⑬</sup>西班牙駐教廷代表加斯帕·波吉亞(Gaspar Borja)樞機更是加入了傳信部,成為其初始成員。<sup>⑭</sup>恰逢伊比利亞聯盟(Iberian Union)時期的葡萄牙,<sup>⑮</sup>則委託前任教廷駐馬德里大使喬瓦尼·加齊亞·米利尼(Giovanni Garzia Millini)樞機代表該國參與到傳信部的建設當中。<sup>⑯</sup>通過米利尼樞機,教廷還提議在馬德里和里斯本分別成立兩個委員會,作為傳信部的分支機構,試圖打破“保教權”的壁壘,加強與葡、西兩國的聯繫。雖然該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足以體現羅馬的態度,即在衝突中尋求出路(*modus vivendi*),<sup>⑰</sup>逐步收回傳教權。<sup>⑱</sup>

在成立初期,傳信部將世界劃分為十三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對應著一名樞機主教,統籌相關工作。除此之外,新聖部還包括一名秘書長和兩名神職人員。<sup>⑲</sup>儘管教皇希望排除教會以外勢力的干預,但那時的樞機團大多由各國王公貴族的家庭成員組成,這些人從未忘記為自己的家族謀取利益。因此,教皇刻意挑選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樞機,一方面為了平衡世俗政權,另一方面也是讓新的聖部更具國際視野。<sup>⑳</sup>這些成員通常每月召開例行大會(Congregazioni generali),當有重要議題出現時,教皇也會親臨現場;針對特殊問題,傳信部會組織臨時性的特別會議(Congregazioni particolari);至於日常事務,則由部長代為處理。<sup>㉑</sup>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天主教會受到宗教改革、伊斯蘭入侵和殖民帝國“保教權”等問題困擾。1545年,羅馬天主教會意大利北部城市特蘭托召開了大公會議,就教義和改革問題進行討論,號召神職人員通過住轄(residence)、講道、牧靈訪問等方式更加親近民眾。大會挽救了拉丁國家的天主教會,確立了教皇的“首席”地位,重構了教會的“絕對”權威。<sup>㉒</sup>在某種意義上,傳信部的成立是特蘭托大公會議精神的延續,<sup>㉓</sup>是天主教會向外拓展、指導和協調的中心。<sup>㉔</sup>

## 二、傳信部與遠東“保教權”

當傳信部成立時,葡萄牙在遠東的“保教權”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葡國政府對傳教士實行了嚴格的管控,未經同意,天主教會無權在其殖民地建立新的教堂或修道院,也不可以任命主教或調動傳教士。<sup>㉕</sup>此外,葡萄牙還要求所有前往遠東的人員乘坐本國船隻,強制“外國”傳教士在本國停留,獲得許可後方可出行。對於傳教士來說,這樣的等待,往往漫長而煎熬,嚴重妨礙了傳教事業,導致衝突不斷。<sup>㉖</sup>

在傳信部的一份檔案中,首任秘書長英格利(Francesco Ingoli)指出,一些傳教士“試圖避開保

教權，從阿勒頗繞道前往遠東。這條道路充滿困難險阻，即便抵達葡屬果阿後，仍有可能被驅逐出境”。<sup>②</sup>那些僑倖留在殖民地的傳教士們時常抱怨，“世俗統治者與教區神父和修士之間的矛盾不計其數，但最終都是以違反宗教豁免權而告終”。<sup>③</sup>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豁免權源自中世紀的聖諭《在主的晚餐中》( *In Coena Domini* )，<sup>④</sup>當中指出教會權力高於一切世俗權力，而神職人員具有宗教豁免權，不可被世俗法庭起訴。這一權力在特蘭托大公會議時得到強調，對於那些違反聖諭的君主，教皇有權施以絕罰。<sup>⑤</sup>另外，傳教士們還認為，“葡萄牙人難以勝任傳教工作，因為他們既無興趣，也無善心”，<sup>⑥</sup>“國王派來的人員不去執行靈魂拯救的工作，反而留在印度從事其他事情”。<sup>⑦</sup>因此，有必要在遠東地區推動“神職人員本地化”的進程，<sup>⑧</sup>那些當地人“既有學識，又有能力，在傳播信仰方面比歐洲人更加適合，因為他們懂得語言，並且了解那裡的習俗”。<sup>⑨</sup>

到了 17 世紀中葉，一度輝煌的葡萄牙帝國開始走向衰落，部分殖民地宣告獨立，另一些則落入荷蘭和英國的統治之下，“保教”工作變得愈發不切實際。傳信部秘書長英格利表示，殖民帝國以傳播天主教信仰為藉口，實則為了征服世界各地，他們“似乎並不希望天主教發展……傳播福音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征服當地百姓，獲得新的人力、財力和地位，而非靈魂的救贖”。<sup>⑩</sup>在教廷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的英格利報告中，他提到了有關印度種姓婆羅門群體的案例，稱部分當地人改信天主教後，難以得到公平的待遇，因為葡萄牙人將他們視為本國的庶民。<sup>⑪</sup>英格利表示，此類案件逐年增加，不僅助長了遠東民眾反天主教的情緒，更加堅定了傳信部反“保教權”的決心。雖然，在殖民帝國的壓力下，教廷無法撤銷這一特權，但在傳信部的努力下，還是對其範圍進行了限定：只有在葡萄牙實際統治的地區，保教權才能生效；在那些葡萄牙人從未控制，或已被新教勢力接管的區域，保教權則自動失效，教廷隨即有權重新派遣傳教士和主教。傳信部將這一理論稱為“功效性保教權”( *Functional patronage* )，<sup>⑫</sup>並宣稱一旦葡萄牙重新奪回失去的領土，願意再次承認其特權。<sup>⑬</sup>

對於傳信部來說，行使管轄權的首要方式就是在傳教區設立教區，讓主教成為新興團體的牧人和最高領導者。當然，傳信部也有權核實教區的管轄範圍，並發表意見，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葡屬澳門教區，在“保教權”的背景下，該教區一度宣稱擁有整個中國教務的管轄權，但教廷果斷予以否決。此外，在對外關係中，教廷的另一個關注焦點是主教任命權問題。葡萄牙堅持認為，遠東的主教受“保教權”約束，應由國王指定；而教廷則希望收回這一權利。為了解決雙方的糾紛，傳信部試圖推廣“宗座代牧區”( *Apostolic vicariate* )，由“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領導。17 世紀初，宗座代牧制的雛形在荷蘭誕生。由於宗教改革爆發，北歐天主教受到新教勢力的影響。1580 年，荷蘭烏特勒支( *Utrecht* )總主教弗雷德里克·申克·范·圖滕伯格( *Federico Schenk van Toutenburg* )去世，後繼無人。該國天主教會由科隆總主教臨時代管。1592 年，教皇克萊孟八世委託教廷駐科隆大使奧塔維奧·米托·弗蘭吉帕尼( *Ottavio Mirto Frangipane* )物色一位宗座代牧，以彌補荷蘭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缺失。1602 年，薩斯博爾多·沃斯米爾( *Sasboldo Vosmeer* )成為首位宗座代牧，領腓立比主教銜( *Filippi in partibus infidelibus* )。1620 年，教皇保祿五世任命菲利普斯·洛維紐斯( *Philippus Rovenius* )為沃斯米爾的繼任者，獲得相同的主教頭銜。在某種意義上，起源於荷蘭的宗座代牧制開啟了天主教發展的新路徑。<sup>⑭</sup>這種模式隨後在印度試行，<sup>⑮</sup>並最終在遠東落根。<sup>⑯</sup>1648 年，傳信部還起草了一份擬在遠東設立的管轄區名錄，其中包括孟加拉、索洛爾、望加錫、暹羅和錫蘭。<sup>⑰</sup>

值得注意的是，宗座代牧通常為領銜主教( *titular bishop in partibus infidelibus* )，沒有實質管轄的教區，因此不受“保教權”的制約。<sup>⑱</sup>只不過，傳信部的這一行為意外激化了與葡萄牙之間的矛

盾,後者認為教廷此舉公然侵犯了帝國的權力,導致兩個同時競爭的傳教網絡出現:(1)處於葡萄牙“保教權”之下的天主教教區;(2)隸屬於傳信部的宗座代牧區。<sup>④</sup>其結果是,傳信部派遣的人員在殖民地常常受到排斥,影響力十分有限。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教廷四處尋找新的合作夥伴,旨在獲得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支持。它將橄欖枝拋向了法國,因為法國國王長期以近乎嫉妒的眼光關注著葡萄牙在東方所取得的成就。早在1603年,當亨利四世重新接納耶穌會士回到巴黎時,就曾以其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為例,試圖證明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到了路易十三統治時期(1610~1642),法國教會更是經歷了一系列的自我革新,<sup>⑤</sup>產生了大量的重要修會,<sup>⑥</sup>促成了所謂的“天主教文藝復興”(Catholic renaissance)。<sup>⑦</sup>

1658年,傳信部與巴黎外方傳教會合作,派遣陸方濟(François Pallu)和朗伯特(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前往遠東,任命前者為越南東京宗座代牧,領赫里奧波里斯主教銜(Titular Bishop of Heliopolis in Augustamnica),兼管中國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廣西和老撾;後者為交趾支那宗座代牧,領貝魯特主教銜(Titular Bishop of Berytus),兼管中國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和海南。<sup>⑧</sup>不久之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另一名會祖高納爵(Ignazio Cotolendi)被任命為南京代牧。<sup>⑨</sup>1659年,傳信部頒布了一道名為《致中國、東京、交趾支那及周邊地區宗座代牧》的訓令(*Istructio*),概述了其傳教計劃的基本路線:“傳信部派遣爾等主教前往那些地區的主要原因是,盡一切可能培育當地民眾,使更多、更適合的年輕人接受聖秩”。傳信部有意大力培育本土教區神父,因為在主教的管理下,這些人員更加忠誠於教會,從而有效避免某一修會對傳教區的壟斷。<sup>⑩</sup>此外,訓令還賦予代牧祝聖主教的權力,“但須先得到傳信部的同意”。在傳教區,“若當地教徒不公開違背天主教信理,莫要以任何方法說服他們改變傳統習俗和生活方式”。在對華關係方面,訓令提到“沒有任何事情是比把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帶入中國更為荒謬的,爾等要帶去的是信仰,信仰不拒絕,也絕不侵犯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習俗;相反,這些必須得到保護和傳承”。<sup>⑪</sup>

法國介入遠東的傳教活動,一方面推動了東西間的交流,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教廷對外政策的軟弱。最終,法國也享有了類似於葡萄牙的“保教權”,如任命主教、資助教會、管理傳教士等,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羅馬是否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因為,法國與傳信部的合作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之上,前者從教廷獲得傳教的權力,進而對殖民地的政治產生影響;後者則利用法國的人力和財力,開闢了新的傳教事業。值此,法國的勢力範圍也從原有的殖民地,逐步擴展到了非洲、近東、遠東甚至南美洲。正如歷史學家克洛德·普魯多姆(Claude Prudhomme)所言,教皇賦予法國保教的權力,秉承了世俗君主支持天主教擴張的傳統,成為對抗葡萄牙的最佳途徑。<sup>⑫</sup>

### 三、傳信部與遠東教務

長期以來,遠東地區教務一直是教廷關注的焦點。1664年,傳信部成立了“中國及東印度問題特別委員會”(Congregatio Particularis super rebus Sinarum et Indiarum Orientalium),由多名樞機主教組成,定期會面,專門討論遠東教務。<sup>⑬</sup>對於當時的羅馬而言,遠東教務一方面受到葡萄牙“保教權”的干預,另一方面還面臨著“中國禮儀之爭”的困擾,兩者之間相互作用,彼此影響。

關於“中國禮儀之爭”,其核心問題在於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等。<sup>⑭</sup>一些學者認為,禮儀之爭的爆發時間在1630年左右,可以追溯到近代早期首批在華傳教士們;另一些人則表示,其起源可能更早,始於印度果阿傳教士之間的爭端;還有一些學者稱,其根源來自宗教改革與反改革運動。不論如何,所有的爭論都集中在一個共同點上,即當以基督宗教為載體的歐洲文明遇見中華文明

時，應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融入對方。<sup>⑤</sup>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有關中國的消息大多源自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後者“構建”了這個遠東大國的形象，介紹了其豐富的文化、傳統和宗教思想。<sup>⑥</sup>當禮儀之爭傳到羅馬時，教廷組織了一個由神學家和樞機主教構成的委員會，調查和研究爭議的每一個細節。此外，教皇英諾森十世（1645）、亞歷山大七世（1656）和克萊孟九世（1669）也曾試圖平息爭端，統一傳教方法，但相關努力未能奏效。由傳信部派出的傳教士希望維護教義的正統性，反對耶穌會，特別是利瑪竇提出的“文化融合”方法。<sup>⑦</sup>一時間傳教士與世俗政權、傳教士與傳教士、傳教士與平信徒，甚至平信徒與平信徒之間紛爭四起。羅馬教廷擔心遠東地區發生混亂，因此支持傳信部採取的“強硬態度”，旨在消除“每一個危險的迷信萌芽”。<sup>⑧</sup>

1700年，傳信部成員之一阿爾巴尼（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樞機加冕成為教皇，取名克萊孟十一世。此前，他還在宗教裁判所、禮儀部、主教和修士部、樞機會議事務部（Consistorial affairs）、伯多祿工廠等聖部任職，擁有豐富的教廷工作經驗。<sup>⑨</sup>在克萊孟十一世在位期間（1700～1721），遠東教務工作（尤其是對華關係）成為其關注的焦點。1701年，剛上任不久的他便決定選拔一名“為人謙虛謹慎、聰明睿智、值得信賴且不受任何世俗勢力影響”的特使（*Legatus a latere*），<sup>⑩</sup>避開葡萄牙的“保教權”，通過傳信部直接前往中國。<sup>⑪</sup>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使節，教廷通常傾向於選拔意大利的神職人員，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大多政治中立；另一方面則是在教育和文化上，受羅馬的影響較大。<sup>⑫</sup>最終，克萊孟十一世將目光鎖定在了一位年輕的都靈神父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ard de Tournon）身上。<sup>⑬</sup>

多羅是傳信部派往中國的首位特使，在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關於多羅訪華的目的，學界多有爭議。以耶穌會檔案為研究基礎的學者認為，多羅來華是為了執行教廷對中國禮儀的禁令。<sup>⑭</sup>當然，這有道理，但並非史實的全部。<sup>⑮</sup>如果翻閱教廷的官方文書可以得知，多羅訪華的使命首先是了解中國教會的概況，尋求天主教君主之間的和平，解決在華傳教士之間的紛爭，建立教堂、設立教區、任命主教，以及在羅馬和北京之間建立一種更為緊密的聯繫（*Corrispondenza*）。<sup>⑯</sup>在“中國及東印度問題特別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中，與會人員也就特使訪華問題做出了說明，多羅於1702年離開羅馬前往中國，而教皇克萊孟十一世第一次就“中國禮儀”問題表態發生在1704年，所謂的教廷遣使是為了執行禁令，可謂是“無稽之談”。<sup>⑰</sup>此外，在多羅來華的過程中，法國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任教廷駐法國大使菲利普·安東尼奧·瓜爾特里奧（Filippo Antonio Gualterio）在一封書信中表示，路易十四國王已做好了萬全準備，確保特使能夠順利抵達遠東。<sup>⑱</sup>在多羅寄往羅馬的報告中也證實了這一點，他乘坐法國船隻，中途在馬達加斯加附近的法屬殖民地短暫停留，<sup>⑲</sup>體現了傳信部與法國的密切合作關係。

1705年4月，在經歷了近三年的航行後，多羅一行終於抵達澳門附近的小島青洲。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已是深夜，時任澳門總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和主教賈修利（João de Casal）仍前往特使住所，熱情迎接。<sup>⑳</sup>然而，當多羅與康熙的會面失敗後，戴冰玉卻判若兩人，他派衛隊看守多羅的住所，同時告知後者無權發布任何公文。<sup>㉑</sup>多羅請求總督解除士兵對他的看管，因為這讓中國官員都覺得“不可理喻”。<sup>㉒</sup>與此同時，澳門主教賈修利也下令，禁止當地官民承認多羅的權力，嚴禁傳教士服從他的指令，“凡服從者，必受拘捕”。<sup>㉓</sup>

從起初的“待若上賓”到後來的“如臨大敵”，澳門當局態度的轉變與葡萄牙的“保教權”不無關係。在一封寄往教廷國務院的信函中，多羅表示：“我介於教皇和葡王之間，（澳門主教）曾想通

過我調至其他教區,或者起碼可以離開這裡,因為此處的局勢極其複雜……然而,今非昔比,當他從果阿和葡萄牙收到反對我本人管轄權的命令後……完全放弃了服從”。<sup>⑭</sup>1706年5月6日,澳門主教公開宣布,教廷特使一行違背了葡萄牙的“保教權”,未經允許便“擅自妄為”。<sup>⑮</sup>在其勢力範圍內,即便是“教皇的聖旨,也要經過葡萄牙政府的同意,否則均視為無效”。<sup>⑯</sup>對此,多羅回應稱,“作為教會之子,必須要承認教廷特使的權力,及其發表的牧函和法令……(澳門主教的)言行既無根據,也無效應”。他坦言,葡人對遠東教務百般阻撓,讓傳信部的地位岌岌可危,即便自己擢升為樞機主教,也僅有當地的一位中國官員前來道賀,不禁令人唏噓。<sup>⑰</sup>

多羅的悲慘境遇讓教廷如夢方醒,堅定了其對抗世俗君主的決心。1715年,克萊孟十一世頒布一道名為《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的通諭,全面禁止中國禮儀。這個禁令不僅針對中國,還包括了周邊的所有地區。1742年,教皇本篤十四世頒布宗座憲令《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肯定了克萊孟十一世的決策,要求所有傳教士對教廷絕對忠誠,無條件服從。與前任一樣,本篤十四世也曾在宗教裁判所任職,有著豐富的教廷工作經驗和閱歷。他堅信,有必要重整遠東教務,解決禮儀衝突,因為它已不再是單純的教義之爭,而是成了王權與教權之間的博弈。為此,本篤十四世以“絕對”的權威和“無畏”的決心,徹底結束了這場持續數個世紀的爭端。

## 結 語

1622年,教皇額我略十五世成立傳信部,自此改變了教廷對外的政策路徑。傳信部是歐洲歷史上宗教改革與反改革的產物,是天主教特蘭托大公會議精神的延續,是羅馬教會邁向全球化的見證者和推動者。在成立之初,傳信部秘書長英格利就表示,其目標是“遠離政治和商業”,<sup>⑱</sup>專注牧靈工作,融入各地文化和習俗”。<sup>⑲</sup>

針對遠東地區,教廷從一開始便致力於將福傳工作與殖民主義劃清界線。為了對抗葡萄牙的“保教權”,傳信部設立了“宗座代牧區”,旨在增加傳教區的主教數量;創辦公學,推動神職人員本地化。<sup>⑳</sup>另外,它還與法國合作,開闢新的傳教事業。面對“中國禮儀之爭”,教廷又突破層層阻撓,通過傳信部派出首位訪華特使,只為與清廷建立聯繫,暢通溝通渠道。只不過,傳信部的活動終究難逃世俗權力的束縛,加上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多羅訪華以失敗告終,中國教會自此陷入僵局,遠東教務停滯不前。實際上,教廷特使的多舛命運僅僅是各方矛盾的一個縮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無論如何,近代早期的傳信部代表了一個嚮往自由的天主教會,提倡的是一條彼此尊重、平等互惠的文明交往之路。在國際格局複雜多變的今天,如何摒棄文明的衝突,超越文明的隔閡,加強文明的互鑒,依然是值得中、西思考的重要課題。

---

①⑭⑱⑳⑳ Josef Metzler, *Compendio di storia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 o "De Propaganda Fide" 1622-1972*, Rom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 p. 23; p. 23; p. 34; p. 22.

②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弗朗西斯·波吉亞(Francis Borgia)曾建議教皇庇護五世(1566~1572)設立一個與傳教牧靈事務有關的聖部,但因西班牙國王菲利

浦二世的反對而作罷。與此類似的事件還發生在教皇額我略十三世(1572~1585)和克萊孟八世(1592~1605)時期。參見 Josef Metzler, “La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e lo sviluppo delle missioni cattoliche (ss. XVIII al XX),” *AHig*, 2000 (9), p. 146.

③1967年8月15日,傳信部更名為萬民福音傳播部。2022年6月5日,《你們去宣講福音》(*Praedicate*

evangelium) 宗座新憲章生效,萬民福音傳播部與促進新福傳委員會合併,成為福音傳播部。參見劉國鵬:《從宗座憲章 *Praedicate evangelium* 的頒布考察羅馬教廷的改革思路、結果與影響》,《基督宗教研究》第 32 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 年。

④早在 1622 年 1 月 15 日,傳信部曾向教廷駐外使館發出通函,其中提到,教皇關心的是“一切與靈魂有關的事宜,沒有事情比維護天主教信仰更加重要”,教會“一方面需要堅定教徒的信仰;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教徒中傳播天主教”。通函原件參見 Archivio Storico di Propaganda Fide (APF), Lettere, vol. 2 (1622-1623), ff. 2r-4r。

⑤中文譯名參照劉國鵬:《梵蒂岡原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 1622—1938 年間有關中國天主教會文獻索引鉤沉》,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⑥Nicola Kowalsky and Josef Metzler, *Inventory of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or “De Propaganda Fide”*, Rom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14; 劉國鵬:《梵蒂岡原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 1622—1938 年間有關中國天主教會文獻索引鉤沉》。

⑦額我略十五世是歷史上唯一一名曾在羅馬公學求學的教皇。參見 Giovanni Pizzorusso, *Governare le missioni, conoscere il mondo nel XVII secolo*, Viterbo: Sette Città, 2018, p. 35。

⑧由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利安一世領導的德意志天主教勢力軍事聯盟(1609-35),旨在阻止新教的擴張。

⑨Ludwig von Pastor, *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 Medioevo: compilata col sussidio dell'Archivio segreto pontificio e di molti altri Archivi*, vol. 13, Roma: Desclée & C. Editori Pontifici, 1928, p. 224。

⑩⑪⑫⑬⑭⑮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Rom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5; p. 26; p. 96; p. 203。

⑯⑰⑱⑲⑳㉑㉒ Giovanni Pizzorusso, *Governare le missioni, conoscere il mondo nel XVII secolo*, p. 35; p. 37; p. 112; p. 113; p. 114; p. 120。

㉓APF, Acta, vol. 7, f. 268v。

㉔APF, CP, vol. 1, f. 625v。

㉕1580 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國王菲利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國王,從而形成西班牙—葡萄牙王朝聯盟,為當時世界上海權最大、領土最廣的國家,直到該聯盟於 1640 年瓦解。參見 Luís Reis Torgal, “A Restauração-Sua Dinâmica Sócio-política,” *Ideologia Política e Teoria do Estado na Restauração*, vol. I, Coimbra: Biblioteca Geral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81, pp. 69-85。

㉖Silvano Giordano, “Il cardinal Giovanni Garzia Millini e la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in Filippo Lovison & Luigi Nuovo (eds.), *Missione e carità. Scritti in onore di P. Luigi Mezzadri*, Roma: Edizioni CLV, 2008, pp. 251-268。

㉗Esther Jiménez Pablo, “The Church in Spain, the Holy See and the First Propaganda Fide Missionaries in the Indies,” in Péter Tusor and Matteo Sanfilippo, *Il Papato e le chiese locali. Studi*, Viterbo: Sette Città, 2014, pp. 287-300。

㉘Nicola Kowalsky and Josef Metzler, *Inventory of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or “De Propaganda Fide”*, p. 17; 劉國鵬:《梵蒂岡原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 1622—1938 年間有關中國天主教會文獻索引鉤沉》。

㉙關於特蘭托大公會議,參見張銳:《教廷對宗教改革的回應》,天津:《經濟社會史評論》,2023 年第 4 期。

㉚Giovanni Pizzorusso, “The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 and Pontific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Non-Tridentine Church,” in Michela Catto and Adriano Prosperi (eds.), *Trent and Beyond, The Council, Other Powers, Other Cultures*, Turnhout: Brepols, 2017, pp. 427-440。

㉛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第 75 號,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編譯,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92 年。

㉜起初,葡西兩國也禁止傳信部的傳教士搭乘本國船隻。即使是少數透過其他方式抵達目的地的“幸運兒”,也很難進入兩國的勢力範圍,這種情況直到 1633 年才有所緩和。關於國王任命遠東主教一事,

傳信部最初予以承認,並呼籲世俗君主慎用該權力;但最終決定由傳信部從羅馬直接派遣,哪怕路途遙遠,成本高昂。參見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28。

②⑥Josef Metzler, “Problemi missionari,” *S. C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1622-1700*, vol I, Roma 1976, pp. 35-36。

②⑦APF, SOCG, vol. 98, f. 95r。

②⑧③④APF, SOCG, vol. 192, f. 7r; f. 7v; f. 7v。

②⑨這是一份譴責異端、分裂、褻瀆、侵犯教皇與教會特權等罪行的檔案。1363年由教皇烏爾班五世頒布。參見 John Prior, “In Coena Domini”, in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7,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0。

③⑩Elena Bonora, *La Controriforma*, Bari: Laterza, 2020, p. 31。

③⑪APF, SOCG, vol. 192, ff. 51r-54r, 尤其是 f. 52r。

③⑫APF, SOCG, vol. 192, ff. 35r-45v。關於教廷傳信部在中國的本地化政策,參見 Rui Zhang, “The Indigenization Policy of Propaganda Fide: Its Effectiveness and Limitations in China (1622 - 1742)”, in *Religions*, vol. 14 (2023), 1453。

③⑬⑭Francesco Ingoli, *Relazione delle quattro parti del mondo*, edited by Fabio Tosi, Rom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53; p. 154。

③⑮Eutimio Sastre Santos, El ajuste de la jurisdicción en el vicariato apostólico de Holanda 1621-1626, in *Euntes docete*, vol. 3 (2008), p. 178。

④⑩瑪竇·德·卡斯特羅(Matteo de Castro)出生於印度的一個婆羅門家庭,其父母為基督徒。卡斯特羅曾在羅馬學習,後成為宗座代牧並被派至印度果阿。然而,在兩次嘗試失敗後,他最終回到羅馬,直至去世。參見 Giuseppe Sorge, *Matteo de Castro (1594-1677)*, Bologna: Queb, 1986。

④⑪參見謝子卿《17世紀法國入華傳教士東西交通路線初探——早期法國遠東擴張和天主教入華傳教的相互關係》(福建泉州:《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17世紀法國和暹羅邦交過程中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福建廈門:《南洋問題研究》,2014年第1期)

以及李紀《巴黎外方傳教會所藏滿洲代牧區檔案的整理與研究》(香港:《天主教研究學報》,第10期,2019年)等。

④②④⑦Donald Frederick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3, book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p. 228; p. 229。

④⑤Roland E. Mousnier, *The Institutions of France under the Absolute Monarchy*, trans. by Brian Pearce,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pp. 340-342。

④⑥聖事會(Compagnie du Saint Sacrement)、遣使會、巴黎外方傳教會都誕生於這一時期的法國。

④⑧J.-B. Etcharren, “Les grandes dates de l’histoire des MEP depuis le XVII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 dans Catherine Marin (dir.),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350 ans à la rencontre de l’Asie, 1658-2008*, Paris: Karthala, 2008, pp. 15-16。

④⑨Gilles Van Grasdorff, *La belle histoir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658-2008*, Saint-Armand-Montrond: Editions Perrin, 2008, p. 46。

⑤⑩傳信部希望從教區神父中選拔主教,其原因在於修會的修士擔任主教後,難免會偏袒自己所屬修會。當然,這種做法引起了一些宗教團體和世俗權力的反對。參見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27。

⑤⑪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29; 訓令原件可參見 Arch. MEP, Collectanea I, n. 135。

⑤⑫Claude Prudhomme, *Missions chrétiennes et colonisation, XVI-XX siècles*, Paris: Cerf, 2004, p. 56。

⑤⑬Nicola Kowalsky and Josef Metzler, *Inventory of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or “De Propaganda Fide”*, p. 147; 劉國鵬:《梵蒂岡原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1622—1938年間有關中國天主教會文獻索引鉤沉》。

⑤⑭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可參見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⑤⑮Jonathan D. Spence,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Europeans (1661-1722)”,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Sankt Augustin-San Francisco-Nettetal: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4, pp. 15-16.

⑤⑥Gaetano Ricciardolo, “L’aspetto reale e la componente mitologica nell’immagine della Cina trasmessa dai gesuiti in Cina: Miti e realtà”, in Alfredo Mario Cadonna & Franco Gatti (eds.), *Atti del convegno, Venezia, 21-23 maggio 1998*, Venezia: Cafoscarina, 2001, pp. 411-419.

⑤⑦Andretta Stefano, “Clemente XI in Enciclopedia dei papi”, in *Enciclopedia dei papi*, vol. III, Roma: Enciclopedia italiana, 2000, p. 414.

⑤⑧⑥①⑥③⑦⑩參見意大利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館藏手稿文獻, Biblioteca Casanatense (BC), Manoscritto (Ms) 1636, f. 14r; f. 14v; f. 101r; f. 119v; f. 206r.

⑥③關於多羅特使的手稿文獻, 可參見 Rui Zhang, “Maillard de Tournon: The First Papal Legate to China (1702-1710) and His Unknown Manuscripts”, in *Religions*, 2022, 13 (12), 1137.

⑥④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9年, 第94頁; 伍昕瑤:《教廷特使多羅與澳門》, 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5年, 第26頁。

⑥⑥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Sec. Brev., Reg. 2509, ff. 34r-38v.

⑥⑦APF,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 Indie Orientali-Cina, Misc. 66.

⑥⑨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110; Fernando Combaluzier, “Passage et séjour de 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patriarche d’Antioche, Visiteur apostolique et Légat de Clément XI pour la Chine et les Indes orientales”, in *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naire*, Seminar Schöneck/Beckenried, 1950, p. 275.

⑦①Arrivée de M. le Patriarche à Macao, *Relation abrégée de la persécution de la Chine*, 1714, p. 195; 伍昕瑤:《教廷特使多羅與澳門》, 第36頁。

⑦②BC, Ms. 1638, f. 236v.

⑦③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 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8年, 第158頁。

⑦④BC, Ms. 1638, ff. 18r-18v;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185.

⑦⑤伍昕瑤:《教廷特使多羅與澳門》, 第40頁。

⑦⑥BC, Ms. 1638, ff. 19v-23r;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186.

⑦⑦BC, Ms. 1638, ff. 21r-21v;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187.

⑦⑧值得注意的是, 針對在華傳教士, 並不禁止經商, 以便他們可以自給自足。參見 Josef Metzler, *Compendio di storia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 o “De Propaganda Fide” 1622- 1972*, p. 25. 此外, 教皇額我略十五世不僅個人為傳信部募捐, 還動員身邊的樞機主教為新聖部的成立慷慨解囊。參見 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p. 27。

⑦⑨參見 S. C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1622-1700*, vol. III/2, Roma, 1976, pp. 697-704.

作者簡介: 張銳,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博士。上海 200241

[ 責任編輯 陳志雄 ]